



三十六计与古今战争

第三十三计：『反间计』

毛炜豪



原典

反间计,是指收买或利用敌方派来的间谍为我所用。在《三十六计》中,此计原文为:“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意思就是在已经布置好的疑阵中再布一道疑阵,将敌人派来的奸细为我所用,这样自己就不会有任何损失。

在《孙子·用间》中,孙子将间谍分为五类: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所谓反间,就是“因其敌间而用之”,是一种“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计谋。

古代战例

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忌、段期率大军攻打鲁国。他们听说鲁国的将领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吴起,很不以为然。两军对垒,鲁军按兵不动,田忌暗中派人去鲁营打探情况,得知吴起正与士兵们席地而坐、分羹同食。田忌听报,大笑说:“将尊则士畏,士畏则战力,吴起竟然如此低贱,怎么能威服将士呢?我毫无顾忌了。”田忌又派亲信张丑以和谈为名,前去鲁营探听情报。吴起很清楚对方意图,于是把精锐部队藏于后营,故意让张丑看到鲁营中到处是老弱病残的士兵,士气萎靡不

振。就连吴起本人也装作畏怯懦弱的样子,请求与齐军议和。田忌听取张丑的汇报后,更加轻视鲁军,放松警惕。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吴起预先设下埋伏,亲率一队精锐兵士偷袭鲁营,趁敌方混乱放起大火,齐军拼命突围,又被鲁军伏兵掩杀,最终齐军大败而归。逃回齐国后,田忌责怪张丑的情报不准,张丑也困惑不解,思索一番后,二人才意识到,原来中了吴起的反间计。田忌无奈感叹道:“吴起用兵,可比孙武、穰苴,我不如也。”

现代战例

1960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向英国军情五处通报,根据内线消息,英国海军部设在多塞特郡一个水下武器研究中心的职员霍顿有重大间谍嫌疑,此人曾在波兰工作,疑似被苏联情报机构策反。但军情五处并不急于逮捕霍顿,而是“放长线钓大鱼”,以霍顿为抓手,争取破获其背后的整个间谍网。军情五处通过严密监视,发现有两个人与霍顿联系密切。一个是他的情

妇盖伊,与他同在一个单位,并借工作之便为霍顿提供大量英国海军装备情报;另一个是他的接头人,一个名叫朗斯戴尔的加拿大年轻企业家。军情五处调查朗斯戴尔存放在银行的物品,发现了全套间谍工具包,军情五处通过与美国和加拿大情报部门合作,弄清了朗斯戴尔的真实身份——一名曾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苏联间谍。为不打草惊蛇,军情五处跟踪监视朗斯戴尔,

并查出其在伦敦的情报中转地在一对夫妇家中。

1961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给军情五处发来密电,揭露霍顿身份的内线准备逃亡美国,这意味着整个霍顿间谍网可能会被撤消,朗斯戴尔等间谍可能会突然消失。于是军情五处迅速行动,将霍顿背后的间谍网一网打尽,悉数抓获5名间谍。经审讯,那对夫妇果然也是苏联克格勃间谍。

计谋分析

在战争中,双方使用间谍是十分常见的。《孙子兵法》就特别强调间谍的作用,认为将帅打仗必须先了解敌方情况。要准确掌握敌方的情况,不可靠鬼神,不可靠经验,“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里的“人”,就是间谍。既然有“用间”,则必然有“反间”。反间计大致分两种,一是设法收买对方间谍,为己效力;二是设法欺骗对方间谍,诱使敌人上当受骗。

然能被我方收买,也有可能被其他势力收买。历史上,“三面间谍”甚至“多面间谍”不胜枚举,因此,要使用多种手段,确保牢牢控制对方间谍,掌握情报主动权。二是对于对方间谍提供的情报,要综合采取多种手段印证核实。如难以核实,那么对于此类情报的使用要保持慎重态度,决不能完全依赖于此类情报实施作战行动,防止掉入敌方精心设计的陷阱。

此外,无论是收买还是欺骗对方间谍,都要高度重视保密问题。孙子指出“上智为间”,而反间计更是用间手段中最微妙、难度最大的一种,任何细节上的疏忽和不慎都有可能招致满盘皆输。因此,凡属重要信息,特别是关键信息,绝对不能泄露出去。要将信息牢牢控制在必要范围内,不仅对于所有相关人员要严加封锁消息,对于有可能接触对方的我方人员同样要严格保密,防止信息有意或无意被泄露。

对于第一种使用反间计的情况,要收买对方间谍,首先要捕获对方间谍,然后在不公开审判的情况下,对其威逼利诱、劝导收买,使其继续给敌方上级提供情报。当然这种情报是价值较低或虚假的,目的是迷惑和欺骗对方,或以假情报换取真情报,以低价值情报换取高价值情报,为我创造有利态势。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两点。一是确保牢牢控制对方间谍。对方间谍被利诱收买说明其立场容易动摇,其既

不利,宋军难以抵挡金军进攻。杜充决定在建康再次出逃,其试图乘舟经水门逃跑,却被百姓的船只堵塞水路。杜充命部下喊话,称自己是去迎敌的,请大家让路。深知其人的百姓纷纷表示自己也是去迎敌的,莫敢让杜公抢先。当天,杜充就这样被困在建康。次日,杜充率三千多亲兵驻扎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真州镇),金将完颜宗弼派人前来劝降,杜充没做多少考虑,便投降了。

微历史

南宋时接替宗泽担任东京(今开封)留守一职的为原北京(宋朝陪都,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留守杜充。杜充性格刚愎自用,又多猜忌,使得东京留守司所属诸军内讧不断,最终引发兵变。兵变发生后,自觉无法留在开封的杜充率领部队放弃开封南下,一路逃至建康(今南京),南逃前还故意掘开黄河,使黄河改道汇入泗水,夺淮入海,直接导致20多万人死亡,灾害无穷。然而此等无耻之徒,却一路扶摇直上,进入国家决策中枢。正应了后人对宋朝的评价:“士大夫无耻。”而这还不是杜充最无耻之处。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军大举南下,作为宋军主将的杜充组织作战

慕尼黑惨案:本可避免发生的悲剧

熊伟 郭大猛

46年前的1972年9月5日,在联邦德国慕尼黑参加第2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遭恐怖分子绑架,最终全部遇难,史称“慕尼黑惨案”。从应急处置角度分析,联邦德国在这次反恐行动前后犯下一系列无可挽回的错误,教训尤为深刻。

营救准备毫无章法。慕尼黑人质劫持事件发生在城市地带,清场疏散、现场封控是行动的必要前提之一。然而,当时的联邦德国在这方面既缺乏经验,也没有执行力度。在劫持事发地奥运会运动员村和营救地点菲尔斯特费尔德布普克军用机场,德国警方对新闻媒体、围观民众封控隔离失利,新闻媒体人员争相抢夺第一手新闻,长期滞留现场进行实况直播,不仅给联邦德国造成政治上的被动,还严重影响反恐行动的准备和实施。联邦德国警方曾计划在奥运会运动员村营救劫持人质,但发现在现场有几十台摄像机将镜头对准据点位置的警察,而每个运动员房间内都有一台电视机,恐怖分子可以获知外面警方的行动。这使得现场解救行动被迫中止,只能另行制定在机场的解救方案。在菲尔斯特费尔德布普克军用机场,当恐怖分子到达前,数以千计的记者、民众已经把机场围得水泄不通,严重影响行动的兵力运用和组织指挥。从营救过程的谈判和行动过程来看,联邦德国严重低估恐怖分子的决心和意图,在奥运会运动员村的几次营救尝试,都被恐怖分子轻易识破,连劫持人质的运动员公寓都无法靠近。在营救开始前的最后一刻,德方连恐怖分子人数都没有搞清。

最大特点是鼠畏器,时刻都要顾忌人质安危,营救行动必须周密细致,留出足够行动冗余度和时间提前量。不幸的是,德国人并未做到这些。在恐怖分子要求提供飞机飞往埃及后,德方提出相应的营救计划,安排恐怖分子和人质乘2架直升机在距客机100米左右的地方着陆,当恐怖分子和人质走过停机坪时,警方狙击手就可射杀恐怖分子。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让17名假扮机组人员的警察在客机里制服他们。这份计划看上去很好,实质上并没有安排足够的应急机动兵力,解救人质的突击方式和路线都非常单一,对如何保证人质、警察、飞行员安全等考虑不足。更要命的是,在发现恐怖分子人数不是5名而是8名时,德方并未对营救行动计划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拒绝以色列反恐专家的帮助,依旧安排5名狙击手设伏。德国《巴伐利亚时报》评论说:“这种斤斤计较的准备,不像是打仗,倒像是分发音乐会的门票。”

现场组织捉襟见肘。在慕尼黑反恐行动中,德方面对的是不可预测、失去理性的恐怖分子,战机稍纵即逝,最强调的应是一个“快”字。可惜他们偏偏没有做到这一点。整个营救行动组织不力、左右支离、节奏拖沓,把本该雷霆一击的突击行动演变成荒唐至极的拙劣演出。在恐怖分子和人质已经登上直升

机,营救行动已经展开的关键时刻,客机中设伏的17名德方警员突然发生内讧,抱怨计划方案预想不周、简直是自杀,擅自组织投票放弃行动,在直升机抵前离开客机,这一变故的临阵脱逃,间接暴露德方营救计划。恐怖分子发觉客机上没有机组人员,很快意识到中了圈套,急忙逃离客机向同伙报信。联邦德国警方的预设伏兵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打草惊蛇,不得不命令狙击手向恐怖分子射击。

更荒唐的是,进入强攻后,德方反劫持小组和行动指挥官之间居然没有对讲机可供联络。当指挥官在指挥塔上命令开火时,只有3名狙击手听到命令,另外2名狙击手在听到枪响后,发现自己正好处在同伴的射击弹道上,只能躲避。实际上只剩下3支狙击步枪在射击8名恐怖分子,双方对射足有一个多小时。事已至此,其实还有挽回可能,反劫持专家认为,如果当时有一支援军赶到,恐怖分子在劫难逃,人质也能够保全。然而,“屋漏又逢连夜雨”,作为援军的警方特别突击队行动失误,着陆位置距离枪战地点足有两公里,根本派不上用场;临机调来的装甲车又被采访车辆和围观民众车辆堵在升路上。最终,恐怖分子炸毁直升机、杀死人质,整个营救行动失败。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绥化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人质解救现场被炸毁的直升机

屡次大难不死的英雄飞行员

闻敏

在俄罗斯,有一位名叫穆罕穆德·托尔博耶夫的英雄飞行员,其职业生涯堪称传奇,曾12次遇险大难不死,还保住一架航天飞机,他的故事在俄罗斯至今为人称道。



托尔博耶夫1951年5月20日出生在苏联达吉斯坦共和国。20世纪60年代初,托尔博耶夫第一次看见飞机,从此驾机翱翔蓝天成为他毕生追求。中学毕业后,托尔博耶夫考入叶依斯克高等军事飞行学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先后在奥德萨军区和苏联驻东德部队集群空军部队服役,能够驾驶多种机型。70年代,托尔博耶夫成为莫斯科近郊的茹科夫斯基试飞院的试飞员。

在托尔博耶夫试飞苏-7B战斗轰炸机时,飞机在转入超音速飞行状态后,涡轮喷气发动机发生喘振,停止工作。托尔博耶夫冷静地控制住飞机,放下起落架,找到一块没有人和农业机械的空地,成功实施迫降,但人的鼻子和脊柱却严重受伤。不过,托尔博耶夫凭借从小练就的一身好体魄,很快恢复健康重返蓝天。

两年后,托尔博耶夫在进行弹射座椅试验时,自动控制装备失灵,直到

离地20米时才打开降落伞成功脱险。如此低的高度开伞,着陆的冲击力对人的身体损害极大,好在托尔博耶夫的身体强健,并无大碍。

除在个人的飞行生涯中屡次大难不死外,托尔博耶夫还保住过苏联研制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1988年11月15日,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由“能源”号火箭搭载发射升空,进行无人测试飞行。在成功环绕地球飞行2圈后,“暴风雪”号开始返回地面。为实时准确掌握航天飞机返回地面

时的情况,托尔博耶夫奉命驾驶米格-25超音速截击机升空,任务是与进入大气层的航天飞机相向而行,之后最大限度接近航天飞机,并伴随其飞行直到降落。期间,托尔博耶夫要向指挥中心传输图像,提供目视观察报告。驾机的托尔博耶夫起先已经发现了“暴风雪”号,却在其钻入云层后失去目视联系,更让人担心的是,地面指挥中心也与“暴风雪”号失去联系,“暴风雪”号此时只能依靠机载计算机控制飞行,所有人都不知道航天飞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托尔博耶夫对“暴风雪”号和自己充满信心,依然按照预定计划继续驾机飞行。为避免“暴风雪”号坠落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面指挥中心通知托尔博耶夫随时准备炸毁“暴风雪”号,托尔博耶夫表示坚决反对。就在这时,“暴风雪”号出现了,同托尔博耶夫一样按照预定计划到达指定空域。

事后查明,因受经常变换风向的瞬间强风影响,“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需要更多时间计算最安全的降落算法,而托尔博耶夫反对炸毁“暴风雪”号的选择,恰恰争取了计算时间,保住了“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乐观首相,非被“气”死

1806年,拿破仑在今捷克境内的奥斯特里茨大败奥地利、沙俄联军,由于此战法国皇帝拿破仑、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均亲临战场,所以此战又称“三皇之战”。

法国胜利的消息传到英国,正在养病的英国首相小皮特十分生气,指着墙上的欧洲地图说:“卷起来吧!”此图十年内再无用处!3个月后,小皮特去世,坊间据此有拿破仑气死小皮特的说法。

其实,小皮特生性乐观,此前每遇到惨败都会在国会以精彩的演讲鼓舞士气,以至有人讽刺道:“(小皮特)每一次杰出表演时,不是一次远征失败了,就是一个王国陷落了。”

小皮特去世的真正原因,实为其自幼体弱多病,又听信庸医,饮酒无度造成的。

莫敢让杜公抢先

南宋时接替宗泽担任东京(今开封)留守一职的为原北京(宋朝陪都,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留守杜充。

杜充性格刚愎自用,又多猜忌,使得东京留守司所属诸军内讧不断,最终引发兵变。

兵变发生后,自觉无法留在开封的杜充率领部队放弃开封南下,一路逃至建康(今南京),南逃前还故意掘开黄河,使黄河改道汇入泗水,夺淮入海,直接导致20多万人死亡,灾害无穷。

然而此等无耻之徒,却一路扶摇直上,进入国家决策中枢。正应了后人对宋朝的评价:“士大夫无耻。”而这还不是杜充最无耻之处。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军大举南下,作为宋军主将的杜充组织作战